

FOGUOGANLANLU ■ FOGUOGANLANLU

● 胡野秋 著

● 安徽文艺出版社



佛國橄欖綠

佛国橄榄绿

胡野秋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合肥

佛国橄榄绿
胡野秋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283 号)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发行 合肥超速印刷厂照排·印刷

开本 787×1092 1/36 印张 6.5 字数 120,000

1990 年 6 月第 1 版 199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7-5396-0396-8/I·345 定价: 2.90 元

卷 首 诗

不要轻率地说
世间的一切
犹如一场梦。须知
世界没有沉睡
它始终在严峻地行动
用警醒的灵魂
为历史
缔造
说不完的格言

——摘自拙诗《七月的果实》

序

麦天枢

好一阵子不写东西了。为一本认真的集子说点儿该说的话，似乎就更有些手不应心的感觉。

我和野秋是同行，在同一个报社里共事，并且还有过愉快的合作。读过这本集子，《佛国橄榄绿》的题目下那些单纯而又真切的让人动情动心的故事和议论，使我知道这里的单纯和真切正与他的人一样。

作为一个成天与社会现象打交道的新闻记者，似乎生活性格和职业性格中，唯有这单纯与认真难以长久。往往见的多了，一切也就淡了，不在乎了，或者说无所谓了。但野秋没有，他依然要求自己认真地对待和思考一个记者眼帘内的各色人物和景象，固执地要求自己“将我目击的生活忠实地传播给读者，……不欺骗读者和自己”。

于是，我们就可以在这本集子中，认识那个壮烈而淡淡死去的更其单纯和认真的陆忠，认识那个

专横而坦然的特殊公民杨明轩，认识那个在国色传统中挣扎沉浮的改革者王光金，认识那些为近些年的中国添了不少色彩和内容的“无为保姆”们……

而从作者的角度来讲，这些简洁透亮的文字中，透过单纯和认真，我们还可以感到许多复杂和深沉。当他淡淡地、平静地描绘了陆忠日常为人性格品质之后，跳过陆忠在闹市残死的血淋淋场面，依然平静地问道：

当陆忠和那伙歹徒对峙的时候，车上的六、七十名乘客哪里去了呢？

当歹徒揪住陆忠衣领，用伞柄击打陆忠头部的时候，这六、七十名乘客哪里去了呢？

当凶手从容不迫地将刀上的鲜血擦去后，揣进上衣扬长而去的时候，这六、七十名乘客哪里去了呢？

.....

人们啊，解一解十八岁的陆忠留给我们的这道方程式吧！（见《十八岁灵魂留下的方程式》）

透过文字的平静，哪一个“人”的心不因此而悸动不安呢？哪一个能够思考的人不因此向自己提出更多的为什么呢？

作者正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善良、明晰和简练，把自己和许许多多同胞在我们共同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疑问提出来，让人们沉思，要人们解答——

用人的良知来解答。

疑问往往比结论更能丰富我们社会的思考和反省。揭示常常比粉饰更能体现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心灵健康程度。

应该说，野秋笔墨和思维接触的，多是生活中不时闪现的人和社会的细微之处。即便面对“陆忠事件”这样的典型事件，他也乐于从人的精神素质、人性内涵这样的角度提出问题。然而，正是这样，才使他的文章段段情真意切，篇篇朴实无华。

这是一个永远的“角度”，中国和中国的头脑们，不论遇到了什么情况，不论处于一个怎样的阶段，只有面对活生生的“人”的现状与未来，面对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愿望，才能走向真正的进步和繁荣。

社会和作者，都不可能有第二个出发点。

野秋献给读者的，是一本报告文学、通讯集。而依我看，把她称作新闻特写集似更合适。这里的大多数篇目都体现着这样一个属于新闻记者的特点：简练，不掺水份，直率地面对生活的真实。事实上，并非沾上“文学”二字就高明。我相信大多数读者都会同我一样：热情地称道作者面向真实的勇气和能耐。

揭示和汇聚真实，是一种走向真理的基本趋向。社会生活首先在广大新闻记者的眼中和笔下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向，特定社会在广大读者和民众眼里才是真实的、亲切的。

愿野秋和更多的同行沿着这条路，始终不息地
强化这一伟大的社会趋向。

1989 年 10 月 16 日 于太原



目 录

序	麦天枢(1)
受洗的女人们	(1)
超越反差	(20)
子弹射出疑问	(42)
色彩之梦	(48)
最后的讨饭棍	(66)
十八岁灵魂留下的方程式	(72)
附：采访手记	(76)
可乐狂人	(79)
佛国橄榄绿	(93)
无品芝麻官	(101)
太阳黑子祭	(106)
“导演”的蒙太奇组合	(125)
明白厂长	(143)
经济改革纵横谈	(156)
人性大写意	(163)
后记	(194)

受洗的女人们

——无为保姆返乡透视

引子 昨天已经泛黄

始于 70 年代末，一股强劲的大潮涌进了中国最令人瞩目的城市——京、津、沪，继而流向各大中城市。汇成这股大潮的，既非商品更非货币，而是活生生的人。确切地说，是女人。

《华尔街日报》曾赫然刊载美联社记者的电讯：《中国乡村妇女占领首都》。

在“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下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人们，好象忽然意识到自己也需要“服务”。于是，“保姆”这个被一直视为剥削阶层“专利品”的新兴产业，从地下走上地面，并为中国公众重新认可。

有人戏称“天下保姆在安徽，安徽保姆在无为。”无为，这长江北岸的无名小县，仿佛一夜之间，从密不透隙的地图上跳了出来。

“无为出保姆”，老辈人都这么说。

战乱年代，这里是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新

四军曾活跃在这里的河湖港汊；解放战争，百万雄师过大江，这里是解放军登陆的重要基岸。

解放后，在首都和其它大城市工作的老同志，回到这儿带走了一些妇女帮助料理家务。逐渐，通过“滚雪球”式的相互引荐，进城操此业者日众，直至“文革”前。

“文革”十年，人以“阶级”分。复杂的人际关系简单化，简单的人际关系复杂化。保姆遂销声匿迹。

当那些旧事成为笑谈的时候，已是1978年。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解决了“肚子问题，”但引发了昔日大集体里不太明显的矛盾：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无为县，出现了近十万剩余劳力。出路安在？

无为，无为，无所作为？

于是，那些不愿闲呆在家里的少女们，试图以自己擅长操持家政的优势，在快节奏的城市里开辟一片天地。

她们背起行囊，怯怯地叩响了城市的大门。

“无为保姆”作为一个新的固定词组，在交谈中、广播里、报纸上重复、传播。短短数年，这支自发的“娘子军”在摩天大楼间左冲右突，游刃有余。人们对此尽管有着不尽相同的评说，但都不能不接受这样的事实：保姆大军已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一个不可或缺的成份。

1982、1983年，无为外出保姆达两万余人。

1986年，该县妇联披露的调查数字，是年在京、沪等地当保姆的仍有8374人。局内人深知，实际人数远不止于此。

昔日连在柏油马路上走道都小心翼翼的农家女们，如今坦然而坚决地踏进了大城市，学会了和城里人讨价还价。“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如此高度的契合，令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大为咋舌。

“嘿，妞儿，上咱家怎样，有彩电冰箱洗衣机。”

“月工资多少？”

“四十五，伙食在外。”

“成！”

……生意就这么一笔笔谈成。难堪也罢，埋怨也罢，人们照旧伴着晨雾聚来，踏着夕阳归去。

商品经济规律一旦作用于生活，便自有魔力。行政手段只能成为蛇足。因此，安徽的一位妇女问题研究专家说：“保姆在八十年代的再度兴起，盖缘于起初就未受到官方的过多注意。”

无为，无为，无为而治。

可是，随着星转斗移，昨天的“底片”开始泛黄了。

在北京的菜场，小保姆们碰面后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你什么时候回家？”

一时，无为保姆遍京华的景象被“胜利大逃亡”的场面所替代。年轻的父母们又开始为找保姆大怵其头，所剩不多的保姆立即身价倍增。据有关部门

估算，无为保姆目前大约只有三四千了。

巨大的落差，在城乡皆掀起波澜。

无为县汽车站，一拨拨的姑娘走下汽车。

远处，小伙子们骑着载重自行车在田埂上曲曲折折地颠着，向土路上脚踩半高跟皮鞋的姑娘大唱《红高粱》插曲——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往前走，莫回头，

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十九……

她们拢拢卷发，背好行囊，归向村庄。

村庄和少女同时感到了陌生。

第一章 回 归

爆炸的都市

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感到拥挤的难受。

北京街头，每天有百万人次的汹涌客流。北京火车站广场是亚洲最大的车站广场，然而，它摇身一变，成了地球上最大的“露天旅馆”。来自华夏各个角落的人们，在这巨大的用花岗岩铺成的“免费统铺”上站着、坐着、躺着。夜晚，这里是首都最骚动不安的一角。

大都市的公共汽车曾以车次多、搭乘方便而傲

视全国，眼下这些优势荡然无存，如今乘公共汽车不拥挤已成为奢望。连昔日人可罗雀的地铁，也今非昔比、人满为患。

与此同时，犯罪率象瘟疫一样以几何级数滋生。

公安机关管理的已不仅仅是自己“治下”的那些居民，而常常面对着众多身份不清、来历不明的公民。罪情通报上的数据也表明，罪犯大多来自于这些“流民”的群落。

暴力犯罪。经济犯罪。性犯罪。警察茫然了。

无为保姆向城市的进军，无意中壮大了这个良莠皆备、黑白二道俱全的集体。

北京人以及到过北京的人都知道：建国门是保姆的天下。

在这里，“黄山来的姑娘”成为各种视线的焦点。有趣的是，身着时髦服装的保姆与打扮极其朴素的主妇们形成强烈的反差，以致于有人常将二者弄错。有位经济学家打趣地说：“年轻保姆们进入商品社会，并开始懂得了‘包装’的重要”。

“保姆市场”在没有人引导下自发而急剧地发展、拓延，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效率之高皆出人意外。记者亲眼目睹过那儿人头攒动、其声器器的“雄壮”场面，相形之下，官方开办的“家庭服务介绍所”则显得门庭冷落，竞争力也大为疲软。

任何一种市场，只有在建立了相应的制约机制后，方可称为完善的市场，自发的保姆市场恰恰缺

乏这种机制。很快，当初看来富有生机的保姆市场开始裂变、畸型。某些个体户将这儿视为他们猎取廉价劳动力的最佳途径；犯罪分子也将魔爪伸向这块没有篱笆的地方。有些保姆踏上社会的第一步，即尝苦果。

城市，冷眼观察着这座使人与价格发生某种联系的立交桥。

终于，它失去了耐心。

今年早些时候，北京市公安局再次发出措辞严厉的通告，明令取缔建国门保姆市场。

北京市人民政府也对市区的人口管理作出了更为缜密的布置。对外地来京的流动人口实行了一系列限制与管理。

爆炸的都市决不能爆炸。

旷野在召唤

复苏的中国农村好象从来没停止过召唤自己那些背井离乡的女儿们。

她是用原始而直率的方式发出召唤的。

春节，保姆们要回自己的家乡过年，岁岁如此。

面对父老乡亲掩饰不住的满足，她们只报之微笑。因为她们已经领教了外面的世界。她们打开带回来的电视机，看到家乡人在比基尼泳装和太空舞面前瞠目结舌的模样，她们吃吃地笑。

她们带回来很多新奇的故事：城里的大街上，人和车不能走一条道；城里的房子象火柴盒一样摞着，回家得坐电梯；城里人晚上还时兴逛马路……

她们多想家人能告诉自己一些新的东西。可家里人不停地说，今年猪下了几个崽，开春要再点一亩豆子……她们听得直打呵欠——还是那些从小就听熟的事。然而，这能怨家里人吗？他们的日子从来就是这样过的，每一年几乎都是上一年的翻版。

她们的思想开始不安分了。

一位名叫张玉霞，操一口京腔的姑娘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在城里越呆下去，越觉得家里人太屈了。尤其每年回一趟家，看到家乡没什么变化，心里更不是滋味。想想城市和农村的差别那么大，自己在城里虽不愁吃穿，玩得也挺好，但总是不踏实。

这些曾经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陶醉的姑娘，渐渐体味到某种缺憾。城市生活越风光，越勾起她们的乡思。

都市的雇主们迎回了探亲归来的保姆，发现她们虽然在操持家务上仍无懈可击，却变得沉默而多思。此外，对各种各样的信息，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关注。诸多迹象表明，她们的心已不完全属于曾令她们迷恋的城市。

陈秀英现在是一家乡办塑料厂厂长，她说：“我曾在北京作保姆。我一决定回家乡，就开始留意搜集各种经济信息，尤其是致富的门路。每天忙完

家务，就看报纸。我干的那一家是教授，书也很多，我拼命地找觉得将来有用的书看。现在想想，当时的努力还是管用的。”

眷恋黄土地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旷野的清风吹拂下长大的姑娘们，受雇之后，加入了一个个陌生的细胞，与雇主们一道呼吸着并不清新的空气。

每日清晨，上街买菜是她们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光。因为在那儿可以看到与她们有“亲缘关系”的白菜、青椒、萝卜，可以看到灰色的城市中最鲜亮的绿色。那一方绿色，能使她们联想到故土。

住房，住房，每个城市居民对此都大感头痛。保姆们与他们一道体验了个中滋味。入夜，狭小的空间用布帘隔开，各自竭力控制着喘息，然而又分明清晰地听到别人的呼吸。此时，她们感到了“做一个城市人的不易”。

与此同时，那浓得化不开的乡土观念从她们的潜意识里一丝一丝地渗透出来。无论她们在外表上和城市人多么难以区分，这种根深蒂固地溶化在血液里的恋乡之情，却是那样难以排遣。

城市的各种新奇的事物都曾强烈地刺激过她们，使她们未雕的心灵骚动过。现在，这种摩登的外在的刺激已不那么有效了。

中国的女人啊。